

ZHANG WEN TAO NIAN PU

张闻陶年谱

● 胡传淮 著

巴蜀书社



责任编辑：黄小石

封面设计：李文金

张问陶年谱

胡传淮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610012)

总编室电话 (028) 6656816 发行科电话 (028) 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五洲彩印厂印刷

地址：机场路月亮湾体育中心侧 邮编：610043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6 字数200千

2000年1月第一版 2000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册

ISBN7—80659—020—X/I·428

定价：13.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 一

朱则杰

四川胡传淮先生最近的一次惠函，告诉我其所著《张问陶年谱》一书，即将由巴蜀书社正式出版，因此嘱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

这话说起来很远。我得以结交传淮先生，始于1997年6月的首次通信。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书信往还一直没有中断过，并且还相当频繁。这些书信的内容，从我的角度来说，大抵都与《全清诗》有关。特别是在近年《全清诗》的对外联系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的情况下，传淮先生的来信显得更加突出。如今年头四个月，在《全清诗》统一编号的四封收函中，传淮先生就占了三封。而其具体的内涵，则多半是应我的请求，赐教张问陶及其周边有关清代诗人的知识。

清代近三百年间，四川一省涌现过无数的诗人，张问陶尤其被公认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其实不仅在四川，就是在全国，张问陶的诗歌地位也是很高的。盖自明末清初开始，诗人们有鉴于明代诗歌一味模仿汉魏盛唐特别是杜甫一家的教训，逐渐将取径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唐以前乃至宋元的诗歌，并且往往同时取法两家以上风格不尽相同的诗人，通过融会贯通，参合变化，进而形成自身的特色，由此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作家，产生了多种多样的风格和流派。但是，清初的诗人无论怎样学习变化，他们的背后总是隐藏着前代诗人的影子，受到前代诗人的束缚，这也就是后人时常批评的所谓依傍古人。因此，清代中叶被称为“乾隆三大家”或“江右三大家”的袁枚、赵翼、蒋士铨，以袁枚为主帅，提出了“性灵”说的理论，主张诗歌创作要自写性灵，绝去依傍，独立创新。这个观点获得了绝大多数诗人的赞同，从而使这以后的清代诗歌走上了全新的发展道路，真正显示出自己的个性特征。并且从内容主题的角度来看，此时的诗歌也从清初诗歌的沉浸在民族矛盾之中，进而上升为反对封建，追求民主，力争整个社会的进步。张问陶的诗歌从理论主张到创作实际，其精神实质与袁枚等人正相一致，同样体现出一种鲜明的进步倾向；并且由于张问陶生活的时代比袁枚等人稍后一些，因而在诗歌反对封建、追求民主的主题表现上，张问陶还更多地注意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在清代中叶的这场诗歌解放运动中，除了“乾隆三大家”以外，最突出的诗人恐怕就推张问陶了。当时以及后世的许多评论家，都每每将张问陶与“乾隆三大家”相提并论，联类为四；并且由于“乾隆三大家”中的蒋士铨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一些，因此还有人甚至拟以张问陶取代蒋士铨，重新组成一个三大

家集团。张问陶在清代乃至整个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如何，由此不难想见。

但是，正如整个清代诗歌一样，张问陶在今天也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比较而言，由于个人本身的成就，张问陶在清代总数可达十万家左右的众多诗人中，其在后世的研究还算是相当不错的。例如从本书有关附录可以知道，仅最近十余年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过张问陶的诗集《船山诗草》（船山其号），和李白、杜甫等人的诗集一并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书目文献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过张问陶的诗歌选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还出版过该校赵云中先生的专著《张问陶及其诗歌创作》；四川省遂宁市则专门成立了张船山研究会，编纂有《张船山研究资料集》，内部印行；此外各种专题论文以及介绍性文章，其为数就更多了。尽管如此，在张问陶研究上，仍然有许多课题需要进一步深入和加强。即以年谱而论，根据来新夏先生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和谢巍先生的《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等有关书籍介绍，虽然张问陶的年谱在近代、现代、当代分别都编写过一种，但或者是稿本，或者是刻本，或者夹印在杂志之中，一般读者很难读到，并且内容都过于简略，甚至还有有的在谱主的生活年代上也并未完整。这，也正是传准先生本书之所由作。

传准先生长期在张问陶家乡即今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的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担任《蓬溪文史资料》的主编。由于工作上的便利，尤其是主观上的努力，传准先生在张问陶及其他相关人物的资料积累和学术研究方面，逐渐成就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专家，并且还同张氏的后人多有来往。这次传准先生以其十数年之积聚，编

撰为这部新的《张问陶年谱》，不但详细排比考订了张问陶的一生，而且以“谱前”的形式介绍了张问陶的世系和家庭情况，又以“附录”的形式收集了许多稀见的张问陶研究资料，以及历代研究张问陶的论文和著作目录索引。这与此前的张问陶年谱相比，正可谓后出转精。它的学术价值，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当今学术著作出版极其困难的形势下，巴蜀书社能够毅然予以出版问世，使之成为迄今为止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张问陶年谱，这个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对张问陶研究，就是对整个清代诗歌的研究，无疑都是一件大好事。

一九九九年四月中旬写于浙江大学中文系

序 二

王英志

张问陶在清代乾嘉性灵派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说性灵派于乾隆时期以主将袁枚、副将赵翼为代表人物，那么于嘉庆年间则推张问陶为重镇，乃性灵派之殿军。纵观整个乾嘉时期性灵派众多诗人，可与袁、赵鼎足而立为性灵派三大家者唯有张氏。其依据在于张问陶之才非其他一般性灵派诗人可比：一是张问陶有明确的性灵说诗学追求，其观点之完备程度直追袁、赵；二是张问陶诗歌创作成绩斐然，不仅继承了性灵派前辈袁、赵性灵诗之精髓，又因世运之衰败及自身独具的思想、个性而具有新的内容与特色，使性灵诗之价值有新的充分显示。在张问陶之后性灵派已走向衰亡，无人具备重振性灵派的力量，从而使张问陶成为乾嘉性灵派最后一位杰出的诗人，其殿军地位因此而确立。袁枚性灵说最重真性情，张问陶重性灵亦以真性情为创作要旨。首先，他强调创作者必须具备真情实感，有真性情要抒发。因此称“诗人原是有情人”、“好鸟鸣春尚有情”，因为“有情”才能写出真诗，

所谓“热肠涌出性情诗”是情与诗因果关系的生动说明。其次，他指出表现真性情是诗的本质，云“好诗不过近人情”，“自磨碎墨写天真”，“不写性灵斗机巧，从此诗人贱于草”。所谓“人情”、“天真”、“性灵”，皆指“诗缘情”之本质而言。因为主情，故与袁枚一样批评肌理派翁方纲“笺注争奇”，以考据为诗。张问陶于强调真性情的同时，还标举“气”：一曰真气，二曰奇气。“有情那可无真气？”即明确提出真气与真情相辅相成的观点。如果说真情是诗的血肉，真气则是诗的筋骨，更是诗的精神力量，有情无气仍难见诗人之真本色。此“气”从诗人角度而言，是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具有刚正的气质与高尚的人格力量。从诗的角度而言，则是具有劲健的风骨、壮美的气势。张氏重视气，就是重视诗人的品格、气质的修养，从而赋予诗作以气势。另外，张问陶于性灵特别强调“愧我性灵终是我”，喜欢张扬个性，崇尚创作的独到性。

张问陶的诗学观点由于表达形式的限制，比较粗略，不及袁枚《随园诗话》、诗序等论诗专著观点阐述得详尽周全，范围亦不如袁枚性灵说广泛。但其要旨与袁枚性灵说属同调，性灵说的基本精神亦都具备，是不难看出的。且张问陶的性灵说是嘉庆年间的诗论，张问陶亦有其独具的个性、思想，因此与袁枚又有差异。难能可贵的是其差异实际上是对袁氏性灵说不足或弊端的补救，从而使性灵说有所发展。这是张问陶诗论的新贡献。

张问陶的抒情写景诗与其论诗诗所标举的诗学观点在美学思想上是大体同步的，基本上可视为性灵诗。故人评张氏“所为诗，专主性灵，独出新意”。这表现在张诗注重表现自己独具的个性气质、思想感情，给人生面别开的新内容、新意境。

关于张问陶的诗学成就，本人在《性灵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十章有较全面、详细的论说，此处不再赘述了。

我现在想到的是在撰写《性灵派研究》、对张问陶诗学进行研究时，曾为找不到一部比较丰富、翔实的张问陶年谱而深感遗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对张问陶作更深入的探讨。

研究古代文化名人应知人论世，年谱对于学术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历史上许多文化名人，都有后人撰写的年谱，幸运者甚至不止一种。但有的文化名人却很不幸，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无人为之编年谱。张问陶曾有人为之作“简谱”，似乎可谓“幸运”，但嫌单薄、简略，尚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张氏若地下有知，亦不会满足、欣慰。他会与许多有关学者一样，企盼一部全面、具体地反映其一生思想、创作的年谱问世。现在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因为胡传淮先生完成了《张问陶年谱》。至此，张问陶可以说是真正地幸运了。

胡传淮先生供职于四川省蓬溪县政协，蓬溪县与张问陶故乡甚近，两地皆属遂宁市。这种地利条件使胡先生便于与张氏后裔接触，并广泛了解有关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胡先生于张问陶情有独钟，十餘年坚持搜集、研究张问陶的资料，掌握了包括《遂宁张氏族谱》在内的大量珍贵资料。有这样的条件、基础，胡先生才编写出一部内容丰厚的张问陶年谱。

此年谱十餘万言，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了张问陶的世系以及张氏家族诗人等，使人对张问陶的家世有个整体把握。

第二部分为年谱正文，结合时代背景，按年月记载张问陶的生平、爱好、交游及创作成就，重点介绍其著作，系年编谱。

第三部分为附录。一是汇集正史、方志、诗话、族谱，及诗集中有关张问陶的资料，从中可了解他人或后人对张问陶的认识与评价。其中有不少资料是首次公布。二是附录了《张问陶研究资料索引》，它既反映了国内外学界对张问陶研究的成果，又为学者进一步研究张问陶提供了信息。

此年谱体例完备，信息量大，又扎实严谨，其嘉惠士林是不言而喻的，而胡先生则可称之为张问陶的功臣。我与胡先生相知不长，且至今尚无缘谋面；但曾多次通信，切磋张问陶研究的有关问题，从中我颇受教益。通过来信，我能感觉到胡先生是一位热忱、执着、认真、严谨，决心献身学术事业的研究者，令我十分钦佩。现在《张问陶年谱》问世，可喜可贺。胡传准先生的学术道路还长，他的下一步会有更大的成绩，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于苏州大学凌云斋

目 录

序一	朱则杰 (1)
序二	王英志 (5)
谱前	(1)
一、张问陶世系	(1)
二、张氏家族诗人	(9)
年谱	(24)
附录	(141)
一、正史、方志、族谱、诗话、诗集中有关 张问陶的资料	(141)
二、朝议公家书	(152)
三、朝议公行述	(153)
四、张问陶研究资料索引	(161)
后记	(166)

谱 前

一、张问陶世系

元明之际，因战乱，四川人口锐减，明洪武初年，登记到的户籍仅八万余户，实际人口也不满百万。鉴于四川地区人少地多，急待垦殖，明政府多次组织邻近四川的湖广（今湖北、湖南等地）移民入蜀，掀起了“湖广填四川”的第一个高潮（第二个高潮发生在清初），大批移民迁入四川。据《遂宁张氏族谱》（民国十三年刊刻本）载：张问陶的祖先原籍湖北麻城县孝感乡，明洪武二年（1369）迁入四川遂宁县黑柏沟，入川始祖为张万，至张问陶，已历十三世。其世系为：

第一世

张万，原籍湖北麻城县孝感乡（今湖北红安县城关镇一带）白獭河之绿柳村，明洪武二年（1369）迁蜀，卜居遂宁县黑柏沟，卒葬黑柏沟大樟树湾。

黑柏沟位于遂宁东部，距遂宁城十余公里，明清时期属遂宁

县所辖，1954年划归蓬溪县辖。全沟长约十公里，分上下沟，黑柏上沟大樟树湾有张万墓（今存）和始祖祠，黑柏下沟两河口有张氏祖茔和张氏祠堂，大樟树湾和两河口均为张氏祖居地，两地相距约七公里，前者今属蓬溪县任隆镇黑柏沟村五社所辖，今仍名“大樟树湾”；后者今属蓬溪县金桥乡翰林村所辖，今仍名“两河口”，张氏祠堂现为金桥乡人民政府驻地。

关于遂宁张氏源流，张鹏翮在雍正三年（1725）上元日撰写的《遂宁张氏族谱》（雍正版）序中云：“张于姓最蕃，自黄帝第五子挥为弓正，赐姓张，此吾张姓始之矣”；“而家于遂宁之慧云山（即黑柏沟）者，则自明初万公迁蜀始之矣，数传后，子孙繁盛，科第蝉联，德泽绵远，称世家焉。”张问安在嘉庆十二年（1807）十二月一日撰写的《张氏族谱》（嘉庆版）序中说：“吾宗实为留侯（张良）裔，望出清河。自迁蜀以来，凡十有五世，子孙繁衍，散处乡邑。”清钱泳《履园丛话·报应》卷十六和《池上草堂笔记》均载：有一日，张百龄对客人说：“我本汉军张姓，先世系江西人。自元以来，积德累世，人无知者。某公精堪舆，尝卜一地，葬其先人。葬毕叹曰：‘吾子孙如不坠先业，后必出三公’。……葬后生子五人，分居五处。其一处湖广，后生江陵相国居正，谥文忠；其一处四川，入本朝，生遂宁相国鹏翮，谥文端；其一居江南，生京江相国玉书，谥文贞；其一居安徽，生桐城两相国，英谥文端，子廷玉谥文和；其一居长白山，入汉军，即吾先代也。”按菊溪（张百龄）先生，于嘉庆十八年，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谥文勉。合计一支，五房而出六宰相。江陵一房最先发，而先生最后起，最盛者惟桐城一房。今尚科甲蝉联，卿贰接踵。（转引自光绪丁未《张氏宗谱》中卷）。张氏一支五房出六

宰相，风光占尽，有清一代，鲜与伦比。

第二世

张永成，万长子，娶余氏，卒葬遂宁土桥铺（今聚贤乡）。

第三世

张赞，永成子，字邦翊，号靖翁。生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卒于弘治二年（1489）。明景泰五年（1454）进士，官至云南姚安府知府，娶王氏，子二人，女一人。清代《遂宁县志》有传。

第四世

张福暉，张赞次子，隐居不仕。

第五世

张尚威，福暉子，处士，系张鹏翮之高祖，卒葬黑柏沟，其墓今存。清张邦伸《锦里新编》卷二载：“文端公高祖葬遂宁黑柏沟，山势雄峻，落穴端平，惟元神水直出，不能百步转澜，形家以为贵而不富。张氏自文端公后，科甲连绵四、五世，至船山，官阶俱至府道以上。累世皆以清节著，家无余费，彼形家风水之说，诚非无因也。”

第六世

张惠，尚威长子，字教庵，隐居不仕。生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卒于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享年九十七岁，配孟氏，子五人。葬两河口，其墓今存。康熙时状元韩菼撰《教庵公传》，载民国版《遂宁县志》卷五。

第七世

张应礼，张惠次子，字和斋。生于明万历六年（1578），卒于崇祯十一年（1638）。娶周氏，子九人。与张惠合葬两河口。

第八世

张 烺，应礼第四子，字冲寰，号松龄。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享年八十九岁。配景氏，侧室季氏。子六人：鹏翮、鹏翼、鹏举、鹏飞、鹏翥、鹏搏，女二人。

明末清初，四川进入了一个比宋元之际时期更长、情况更烈的战乱与残破时期，四川人民再次遭到了今天难以想象的灾难，从宏观上看，可以说是四川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浩劫。张烺著有《烬余录》（载民国版《遂宁张氏族谱》卷四）一书，自录其生平见闻，起于天启七年，止于康熙五十四年，约八十余年历史，价值与彭遵泗《蜀碧》和欧阳直《蜀乱始末》相等。《烬余录》云：“遂宁为水陆要冲，贼众往来，非宁区”。“吾族自麻城迁蜀家于遂宁之黑柏沟，有明三百年，族姓蕃盛，乃散居于邑西缙溪、土桥、治口、凤台等处，计十三房，凡万有余人”，“劫运后，逃散死亡，靡有孑遗，独余从万死一生中，得延余生”。顺治二年（1645）十月，遂宁屠城，“城中居人，无一存者”，“余诸兄及族姓之在城者，悉遭其厄”，“蜀民至是殆尽矣。”到顺治十八年（1661），四川人口才九万余人，究其原因，张烺在《烬余录》中认为是由战乱、瘟疫和天灾造成的，“今统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也。”

顺治五年（1648）五月二十日，张烺迁居顺庆（今南充市）；六年十一月，张鹏翮出生；八年迁居西充县槐树场大堰沟；十二年迁居杜家；十三年迁居盐亭县廖家沟；十五年迁居于西充县石板场老鸛村；十八年，始归遂宁，居县东赤崖沟，后来张鹏翮作

有《赤崖旧宅》诗和《第一山精舍读书记》。康熙七年（1668），迁居遂宁广济坝。

康熙五十二年，张烺曾到京师为康熙帝祝寿，康熙帝诏问张献忠入川始末。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一载：康熙五十二年四月，上问尚书张鹏翮曰：“明末张献忠兵到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曾有记其事之书籍否？”张鹏翮奏：“无有记其事者。”上曰：“……尔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张献忠入川时计，约已十七八岁，必有确然见闻之处，尔问明缮折进呈。”后由张烺口述，张鹏翮缮疏上闻。

张鹏翮生母景太夫人葬两河口，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熊赐履撰有《景太恭人墓志铭》（载《遂宁张氏族谱》）。张烺卒葬遂宁庆元山（今属重庆市潼南县小渡乡辖），其墓今存。大学士王揆撰墓志铭，礼部尚书陈诜、状元王敬铭分别撰有《光禄公张烺传》，载于民国版《遂宁县志》和《遂宁张氏族谱》。

第九世

张鹏翮，字运青，号宽宇，张烺长子。生于顺治六年（1649）十一月十七日，配唐氏，子二人：懋诚、懋龄，女三人。

张鹏翮系清初名臣及著名学者，康熙九年进士，历官苏州知府、兖州知府、浙江巡抚、江南学政、刑部尚书、两江总督、河道总督、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曾出使俄罗斯，为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立下了汗马功劳。科学治理黄河，使黄河漕运通达，下河连年大熟，人民安居乐业。水利史和科技界称他为“治河专家”。由于他为政清廉，政绩显著，康熙帝称他“不但为今之名臣，亦足重于后世矣！”时人称其为“贤相”。

雍正三年（1725）二月十九日，张鹏翮病逝。雍正帝为他撰写了祭文、墓碑，称赞他：“矢志端方，持身廉洁”；“志行修洁，

风度端凝”；“流芳竹帛，卓然一代之完人；树范岩廊，允矣千秋之茂典”。评价之高，无出其右。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二七九本传、《清史列传》卷一一本传、彭端淑《张文端公传》、陆燿《治河名臣小传》、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国朝名臣传》等，张知铨（张鹏翼六世孙）编有《张文端公年谱》。

张鹏翮卒葬遂宁庆元山，唐太夫人葬山东曲阜南马鞍山。庆元山于民国元年（1912）划归潼南县（今属重庆市），今为潼南县小渡乡月山村所辖。

康熙十四年（1675），张鹏翮召对懋勤殿，命坐赐茶，问父母无恙？荣遇殊甚，遂仿周公得禾、孔子受鲤之意，以16字为派名子孙。16字派为：“懋勤顾问，知遇崇隆，清正仁厚，进德立功。”从第十世起，遂宁张氏就以此字派给子孙命名。

第十世

张懋诚，字孟一，号存庵，张鹏翮长子。生于康熙六年（1667）十月二十日，卒于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十八日，娶罗氏（青州知府罗大美之女，阆中人）、朱氏，子五人：勤望、勤宠、勤保、勤河、勤复；女九人。康熙二十六年举人，历官安徽怀宁知县、奉天辽阳知州、通政使司通政使，署工部右侍郎，诰授通奉大夫，著有《通政诗集》一卷。

张勤望《通奉公（张懋诚）行述》云：“府君服官三十年来，居无一椽，食无半亩，敝衣布被，家计萧然。即退处林泉，借居者九叔父南门之屋，回首时，四壁空虚，一棺清冷，~~食~~宦与老僧无异也。”

卒葬遂宁楼山（今遂宁市中区永兴镇），《遂宁县志》有传、张勤望撰有《通奉公行述》、《罗太夫人行述》（载民国版《遂宁张氏